

诗词的灵魂在于爱的能力

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这些伟大诗人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很遥远,可是有时,我们又感觉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从幼童到老者,都知道他们的名字,都背诵着他们的诗词。他们的诗词,是最富表现力的汉语文本,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趋向无限辽阔。

至于怎样读古诗词,可能是见仁见智的事,但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告诉我们,读古诗词,一定不要忽视这些诗人们诚实流露的“世俗”的一面,他提醒读者:“诗不是现实的对立面,诗首先容纳了现实,继而提供了更美好的生命空间。”

比如陶渊明,与世无争的豁达是他的人格辨识度,但其实他是很焦虑的。他经常在安贫乐道和放弃原则去追求荣华富贵两个选择之间纠结,所以他会写“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这句诗里的“常”字很微妙,诗人不是一时想不开,他时不时就要动摇的。另外,陶渊明也像很多家长一样,为了儿子学习的事焦头烂额,他的几个儿子都不太肯读书,他就很烦恼,写了一首《责子》,“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很无奈。还有,最让他焦虑的是“生死”,他的诗涉及到死亡的内容,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多。

李白在后人的想象中总是意气飞扬的,杜甫是他的忠实粉丝,写诗盛赞偶像“痛饮狂歌空

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但仔细读李白的诗会发现,他也很焦虑,因为他对自己很不满意。

细读陶渊明和李白,今天的人们有必要认识到,能够凌驾于世俗的、充满超越感的生活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名垂青史的诗人,也会在生活中感受着紧张、不安,甚至扭曲,有时候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是显得猥琐的。但他们用诗保存了生命的向往,诗为红尘中的人们提供了更美好的生命空间,诗承载了生命飞扬超脱的渴望,在诗里,人的状态是美的。因为诗的存在,当人从诗的世界回到现实,就有了自省的能力。诗的好处,不仅让诗人,也让读诗的人,有能力更多地克服人性的局限。

同时,骆玉明纠正了对于陶渊明的广泛“误读”,他说:“陶渊明从来没有‘躺平’,他在南山积极地种地!种地是严肃的人生追求,是踏实的生命体验,人在土地上的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真实性。陶渊明通过种地,表达他的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他不是消极的人。”

从魏晋名士到大唐豪杰,中国古诗词所承载的动人意境绝不是逃避主义的,写田园诗的陶渊明追求让生命中的可能性得到最好的实现,他的诗见证了他在人世间从事着积极的创造,而且他的创造是有意义的。杜甫是比陶渊明更为真实亲切的诗人,他更具体地写出了人生的责

任和关怀。杜甫人到中年仍郁郁不得志,他写《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白描了一个低级官吏极度落魄的生活,他路过骊山,远远听到皇室和高门贵族彻夜笙歌,而他寒夜行路,“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冷得手指都僵了。私人生活的巨大不幸还在前面等着他,“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他的孩子在兵荒马乱里饿死了,何其悲惨。然而即便深陷在这样暗无天日的个人悲剧中,杜甫想到了比他更痛苦更无助的人们:“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是对人间有大爱的博大胸怀,也正是因为这份爱的襟怀,让杜甫写出了“三吏三别”这些伟大的作品。

骆玉明说,他在中年时读懂了杜甫,如今年过七十,每每朗读杜甫作品时,仍会忍不住心酸落泪,在杜诗里,他能前所未有的地感受到,诗词的灵魂在于爱别人的能力,有能力去爱别人,这样的人生和这样的作品,才是充实的。

现代人在孤独的、充满不确定的现代生活中,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意识到个体的微不足道,所以会陷入自我质疑。在骆玉明看来,古诗词中表达的生命哲学,为现代人打开了一大片可以平复心灵的精神空间。

就这一点而言,“月亮”成了中国古诗词中独一无二的意象。《春江花月夜》被认为“孤篇盖全唐”,不仅是因为文辞之美,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东流水”,诗人张若虚通过这些描写,同时写出了宇宙的宏大未知与月亮的亲切,在浩瀚无垠的时间和空间中,月亮成为宇宙的使者,月亮让有限的人间和无限的宇宙产生了关联,这份心灵的感染力是巨大的。

不仅《春江花月夜》是这样,追溯中国古代的科学文献,早在汉代就有著作明确标记月亮的光芒来自太阳,在一个农耕社会里,太阳的作用远远胜过月亮,但在中国文人的笔下,反复在诗词里出现的是月亮。“少时不识月,唤作白玉盘”“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是宇宙中永恒无限之力与地上短暂生命之间的纽带,它高挂在天边,温柔光芒平等地普照着人间每一个有意义的生命。诗词也是这样,它们平等地等待着和芸芸众生的读者相遇。骆玉明用一句看似玩笑的话表达了一个严肃的观点:“面对诗和月亮,马斯克和马云挣再多的钱,也不比普通的你更重要。”

每个人都背负着双重生命,既有个体的选择,也无法割裂群体的认同。古诗词是让现代中国人看清群体生命、理解个体与文化传统关联的最好方式,诗词容纳了中国的情感、思维和价值判断,最重要的是诗词以最为精致、细腻且丰富的汉语,充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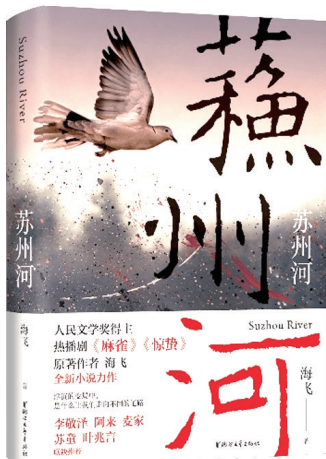


现力地表达着中国人对生命的认知。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年华”,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晦涩的表达之一,引发过无数的考据和阐释。但真正要追究的是李商隐的情事吗?不是的。这句诗超越了具体的男欢女爱,它指向更为广义的青春、时间和生命,人生无端,年华长逝,这份对于生命迷茫和无常的感悟,凌驾于一时一地一段情。

骆玉明说:“李商隐要写的人生充满他那个时代的悲凉,他的梦中留着刻骨铭心的追忆,这和《红楼梦》的意境是相通的——这是最高级的汉语所表达的中国式生命体验。”

(柳青)

本周荐书



《苏州河》
海飞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苏州河》是人民文学奖得主,电视剧《惊蛰》《麻雀》原著作者、编剧海飞全新力作,以诗性的语言,捕捉变革时代的世情人心,再造逝去年月的感伤肖像。

这样的故事,只有在1949年才会发生;这样的人物,只有在苏州河边才会存在。一系列凶杀案离奇发生,警察陈宝山在查案过程中,逐渐发现真相,并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上海研讨山东省“十四五”重点文艺创作项目长篇小说《东进》

红色题材如何创意书写?

晚报讯(记者 孔浩)近日,以“红色叙事、乡土情味与创意写作”为主题的红色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东进》作品研讨会在素有“百年红色学府”上海大学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上海大学中文系等联合主办,分上下半场,上半场为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师生就《东进》的创作与作者对谈。下半场为《东进》青年批评家论坛,来自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等单位的近30位青年学者就《东进》的创作展开研讨。与会评论家认为,叶炜擅长长篇小说的创作,其创作书写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了新乡土写作和新战争叙事并驾齐驱的创作风格。

山东省“十四五”重点文艺创作项目、长篇小说《东进》的文学根据地依然是鲁南枣庄,

叶炜有意寻求乡土写作和战争叙事的融合,兼具历史性和民间性,是抗战史、革命史、地方史和家族史的书写,其探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小说主副线交相辉映,可以说是“软硬兼施”“虚实相生”,融传奇性、地域性、可读性和可视化于一体。在叙述上,动作性非常强,唤醒了读者的古典小说阅读经验,既有革命英雄传奇的味道,也有古典戏曲的韵味。这引发了与会评论家对“红色抗战题材如何进行创意书写”的思考。

的确,在“后革命时代”,如何富有创意地书写红色革命题材,《东进》做出了极为有益的探索。比如,小说的双线叙事为故事提供了两种视角,一种是敢于斗争、甘于奉献、高瞻远瞩、一心为民的革命领导人物的官方视角,一种是亦正亦邪、智勇双全、为家勇担责任、为国甘洒热血的革命人物的民间视角。两种视角交织出了抗战时期八路军、国民党、地方山匪三方互相角力的复杂形势。面对复杂的形势,东进先遣队要面

临的是双重东进:不仅是战略上的“东进”,更是思想上的“东进”。

上海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葛红兵等评论家认为,叶炜作为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博士点创建以来培养第一位创意写作文学博士,是创作与教学的“双师型”人才,是创意写作在中国的亲历者、拓展者和促进者,其文学创作实践和论文写作是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佐证。

叶炜的创作一直坚持立足鲁南的乡土情韵。虽然叶炜访学美国,但创作没有离开故土,《东进》的创作即是如此。叶炜还自觉地把创意写作研究成果融入小说创作,在创作观念上走在前列。《东进》拓展了创意写作的边界,将影视纳入创意写作学科,集合了故事的奇观化、人物的传奇性和语言的影视化等显著特征。《东进》的责任编辑任晓燕代表出版方向本书的创作致以诚挚的敬意,希望叶炜继续心无旁骛、再接再厉,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创作

出更多优秀的三部曲作品,成为中国当代的“狄更斯”和“巴尔扎克”。

叶炜,山东枣庄人,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挂职),中国首位创意写作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院长,浙江网络文学院执行院长。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副秘书长。近年来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与创意写作的研究工作。叶炜发表、出版有长篇小说《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转型时代三部曲》(《裂变》《踟蹰》《天择》)等14部,出版《叶圣陶家族的文脉传奇》《自清芙蓉:朱自清传》等非虚构长篇作品4部。另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300余万字。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新人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山东省五个一精品工程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等。